

人民日报在东焦的峥嵘岁月

鹿泉宜安镇东焦村地处平山、井陘、鹿泉三县(区)交界处,四面环山,距离《人民日报》创刊地平山县里庄村仅五公里。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村筹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时,一批工作人员进驻鹿泉市宜安镇东焦村。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刊后,其采访部和行政后勤等单位设在这里,随后“北上记者团”和人民日报记者编辑培训班进驻这里。1948年10月20日,为躲避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人民日报编辑部及经理部、印刷厂全部进驻东焦村。

自此,人民日报在东焦村开启了145天的峥嵘岁月。

迎来编辑部

1948年初夏,国民党情报部门侦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转移到石家庄和平山县一带。为了减轻东北战场的压力,国民党空军加强了对这一带的袭扰,不时派出飞机进行侦察、轰炸和扫射,1948年八、九月间进入高潮。9月13日至17日,敌机对石家庄和平山县城周边连续轰炸和扫射了五天。里庄村也是敌机袭扰的重点,住在这里的人民日报编辑部人员白天不能再在村里编辑稿件了,只能拿一点干粮躲到村外的庄稼地里学习工作;专供印

刷机用的手摇发电机也不能开,工作人员晚上排字只能用油灯照明,还得在窗户上挂起床单遮光;粮油物资、报纸清样及报纸无法正常运送,供应遇到极大困难。设在石家庄市内的经理部及设在北焦村的印刷厂同样遭到敌机轰炸,造成损失。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人民日报》的编辑、印刷和发行。

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也为了恢复被影响的工作,报社领导决定,将设在里庄的编辑部和设在石家庄市的经理部、印刷厂等单位向地处丘陵地带的东焦村转移。

东焦村是里庄村南八里处的一个丘陵大村,四面环山,有上千户人家、三千多口人,房屋依坡而建,便于隐蔽和躲避空袭。1948年10月20日,住在里庄村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整理行装,入夜后摸黑翻越光禄山,进驻东焦村。

接待记者团

当时住在东焦村东头的许多乡亲们清楚地记得,1948年阴历五月后的一天(应为阳历6月20日)临近中午的时候,正在地里抢种玉米的乡亲发现,村东大路上远远走来一支特别的队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戴眼镜的居多;穿军装背背包却不戴领章帽徽;队伍排得还整齐,走起来却不像军队;一脸的疲

惫一身的尘土,却个个精神饱满,有说有笑,见了乡亲们还唱起歌曲。等这些人晚上住到乡亲们家里大家才知道,他们是从晋冀鲁豫来的“北上记者团”。

1948年6月10日,根据时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张磐石的指示,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决定,由若干名记者组成“北上记者团”,选择冀南、太行和冀中地区的3个点,采访土地改革、整党和生产情况,同时向华北中央局驻地附近靠拢。

华北《人民日报》创刊后不久,报社加紧实施培训计划。7月底,在正定的华北大学,招收20多名青年学生,充实进《人民日报》队伍。9月3日,报名学生离开正定前往里庄,住在里庄以南的东焦村,由游柳塘带领,先学时事政治,再学新闻业务,培训时间不足3个月。1948年底,平津战役全面展开,新闻干部培训班宣告结束。12月25日分配工作后,学员们开启了他们新闻记者生涯。

见证历史重要转折

1948年10月下旬,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组织一支多达五个师的快速机动部队,从北京出发南下突袭石家庄及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做好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自1948年

10月25日至11月2日,连续撰写了三篇新华社电讯稿,通过驻东焦村的编辑部、印刷厂,及时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发往全国各地,唱出了一出现代“空城计”,留下了“三篇雄文退五师”的佳话。

人民日报社迁来东焦村时,上千名干部职工进驻,大小车辆、骡马牲口、电台、排字房、印刷厂一大摊,给住房本不宽裕的乡亲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乡亲们没有怨言,腾出最好的房子让报社人员居住,把他们当成亲人。1949年3月8日和14日,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分两批从东焦村迁入北京。人民日报社在东焦和里庄的日子里,发刊量达44000多份,用人背驴驮的方式从这里送到各地,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希望,鼓舞着广大人民团结奋斗,见证着中国重大历史转折。

时光飞逝,岁月流转。2012年6月27日,鹿泉区到北京组织了《人民日报》在东焦老报人座谈会,张磐石、杨沫的后人以及曾经在东焦村《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的姚勤、伊之、林晰、刘振祥等老同志欢聚一堂,抚今追忆。同年10月,《人民日报在东焦》一书出版发行。2016年,人民日报社旧址展览馆在东焦西队村一处旧址上开馆,并列于鹿泉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摘自《人民日报在东焦》

1881年“留美幼童”被撤回始末

1872年8月11日,一艘客轮从上海启航驶往美国。在船上,有30名中国少年。他们被称作“留美幼童”(年龄在10-16岁间),是大清帝国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随着这艘轮船的启航,中国的官派留学正式开始。其后三年,1873、1874、1875每年各有一批,共120名幼童到美国留学。留学年限定为15年,另加两年游历以验所学,加上行前在上海预备学校肄习一年中西文,共计将近20年时间。然而,到了1881年,原本计划实行20年的教育计划才进行到一半即遭腰斩,留美幼童悉数被撤回。

“可爱的中国男孩儿”

到达美国之后,中国幼童被三五人一组分到美国人家里,与美国人一起生活。这对他们学习美国语言和了解美国生活是非常有益的,但随之也有一些问题。比如,热情的美国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他们亲吻,中国孩子没有这样的习惯,一个个羞得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再比如,美国房东礼拜天去教堂,也要带他们一起去,但朝廷明确规定,不许他们信洋教。

刚到美国时,幼童们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色缎褂,崭新的白底黑布鞋,油亮乌黑的大辫子。这使美国人感到好奇,所以幼童们一上街,就会招来一群美国孩子围观,有的还把他们称作“中国女孩”。这让幼童们非常难堪,但辫子和服饰都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尤其是辫子,那是是否爱国——爱大清的标志。

在学校里,幼童们不仅受到全新的教育,而且开始接受全新的文化。新的生活使他们享受到一种国内学校所没有的自由和舒展,但一旦进入两种社会、两种生活的比较,也会使他们黯然神伤,为自己的祖国而叹息。这一

点,他们与其导师——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毕业生容闳(时任学生监督兼驻美副公使)当年的感觉并无两样。

尽管他们也有先入为主的见解,但他们毕竟年轻,容易接受新事物,所以能够很快适应美国学校,并且融入了美国社会。不仅是一些美国学生,而且包括一些美国同学的家长,都喜欢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是“可爱的中国男孩儿”。让美国人惊奇的是,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孩子几乎一个个都聪明好学、刻苦认真,因而学习成绩优良。

当时的《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国幼童聪明、好学、充满智慧,他们学习的刻苦和取得的成就都是美国孩子所难以达到的。当时的美国社会对来自清国的这些孩子评价甚高,态度也非常友好。1876年,全体幼童应邀出席在费城举办的美国开国100周年世界博览会,他们的作业在博览会上展览,美国总统格兰特亲切接见了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孩子,并与他们亲切握手。

无法防止的“美国化”

到1881年,“留美幼童”们大多已经完成了中学学业,一些人已经进入大学。其中一些年龄稍大的,进程自然比较快,比如詹天佑,这年已经大学毕业。詹天佑从高中到大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进入耶鲁大学后多次获得奖学金。他从到达美国至大学毕业,总共用了9年时间。除此之外,唐绍仪、梁敦彦、蔡绍基等60多人已考入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名校。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朝廷一道命令,他们的学业就被迫中断了。朝廷派幼童到美国留学,目的是把美国先进的技术学到手,回来为大清帝国服务。

因此,他们必然要对幼童有严格要求,必然使他们在政治和思想上坚持中国传统,与专制统治的要求保持一致。为了保证这一点,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读经明理”,包括在遥远的美国给皇帝叩头、给孔子叩头、给派去管理他们的官员叩头,等等。他们原以为,只要有圣贤的经书在,只要坚持礼制秩序,孩子们就会成为既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而又对皇上忠心耿耿的人才,传统纲常是不会被丢掉的。

但事实是,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现代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对十来岁的孩子来说,“美国化”几乎是无法防止的。很快,这些幼童不愿再穿中式服装,不愿再拖着那条辫子,而是经常一身美式打扮出现在学校和街头。尤其是那根招人围观的辫子,既没用,又要费时间梳理,一些幼童索性把它剪掉了。到见朝廷官员时,就弄一条假的临时装上。他们不愿让一条辫子影响他们走向世界,更不愿让服饰阻碍他们融入美国的社会生活。

然而,作为大清帝国的子民,辫子却不只是装束问题,而是汉人对大清帝国的统治是否表示臣服的标志。当朝廷官吏发现幼童对辫子、叩拜、传统纲常的叛逆态度时,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清廷决定撤回全部幼童

在容闳眼里,孩子们的变化都是自然的,但与他一起管理留美幼童的清朝官员,从开始的陈兰彬,到后来的吴子登,都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一定要加强对幼童进行思想和道德教育,彻底扭转他们的西化倾向。于是,一场围绕留美幼童所发生的变化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尤其是在1876年吴子登接任留学生监督之后,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他对容闳管理之下形成的规则和习惯处处

吹毛求疵,但并不与容闳正面冲突,而是采用了不断向朝廷打小报告的方式,说容闳不尽职责,“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他认为:“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应该承认,吴子登是敏感的,看法也相当准确,这些学生注定要成才,却不一定是维护帝国制度和陈规陋习的人才。

既然不能培养出大清帝国所需要的人材,何必花费钱物让他们出国留学?于是,朝廷最后做出决定撤回留美幼童。

此时,留美幼童计划的主要推动者,曾国藩已死,李鸿章态度暧昧。这一切都不难理解,因为清廷支持留学的根本目的,乃是实现富国强兵之梦,以保证大清江山不要落到别人手中。他们对西方文化、资本主义和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本来就视若仇敌。当他们怀疑派出的留学生已经西化的时候,自然要采取措施。

吴子登频频向朝廷奏报,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不遵礼法,容闳如何放纵幼童。最后的结果,就是朝廷决定从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撤回全部幼童。

留美幼童被撤回,无论对容闳,还是对这些孩子,都是一件不幸的事。当时,耶鲁大学校长朴德曾经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时任美国总统格兰特也曾专为此事致书李鸿章,请他为了这些年轻人而劝说朝廷收回成命。但是,帝国自有自己的主张,他们还是坚决地把幼童撤回来了。除了病故的和设法留美不归的,94名幼童全部奉命回国。据《帝国黄昏》李新宇/著